

■ 学者导读

始终不舍的追求

——序《考古文化研究与文献解析：重构古代传说历史》

陈雍

去年夏天，常兴照和王军来天津办事，我从家里赶过去和他们小聚。老同学多年不见，特别是经历了戴口罩三年，聊的话题很多。叙谈间，王军对我说，兴照最近写了本书，想请你写序。我自从“阳”了以后，身体状况不大好，况且不知道书里的内容，当时没敢答应。过了不久，常兴照发来他的书稿，以他一贯的谦虚请我审阅。

读完《考古文化研究与文献解析：重构古代传说历史》书稿，我感佩不已。常兴照大学毕业后在山东做考古工作，20世纪80年代，他整理广饶县傅家、五村遗址发掘资料时，我曾去考察学习。记得他跟我说，傅家、五村应当是大汶口文化鲁北地区的一个新类型，后来他著文论述了“五村类型”。《蚩尤考辩》是他在《海岱考古》编辑部工作时写的第一篇研究古史传说的文章，我原以为，这是由于工作环境的改变，随之而来的研究兴趣转变。看了他的书稿我才知道，始于“五村”的考古学文化研究与始于“蚩尤”的古史传说研究，最终交集在“重构古代传说历史”上，并且成为这个研究目标的两条研究路径。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谋生职业与学术研究若合符节，往往只能是理想上的追求。20世纪90年代，常兴照受命组建山东省文物科技保护中心并主持工作，从此离开了他热爱的考古。2003年以后调到北京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工作。其间，他作为国家文物局援藏干部，任国家文物局驻西藏三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工程办公室技术顾问、副主任，全面负责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萨迦寺等重点文物维修工程技术管理，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和贡献，受到国家文物局、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方面的高度赞扬与肯定。看了他的书稿我才知道，他在做文物保护工作的30多年里，依然坚持“重构古代传说历史”的研究。

这部书稿是常兴照从1989年至2023年撰写的文章里选择20篇编辑而成。其中《浅谈考古文化与传说历史研究》《共工氏文化解析及其流徙辨证》《夏代、夏族与夏系文化论析》《有虞氏王朝概论》《龙山文化与后羿传说》《古史研究中几个争议问题的基本研判》《管窺“三星堆”》《从出土文献看楚人早期历史》等8篇是没发表的文章，《北辛文化与炎黄传说》是依据《炎黄文化东西说》扩充改写的。这几篇颇有分量的文章几乎占了全书篇幅的一半，很是令人瞩目。《浅谈考古文化与传说历史研究》和《古史研究中几个争议问题的基本研判》，体现了他对考古学文化与传说历史整合研究的独到见解，在全书中起到纲领作用。

重建盘庚迁殷以前的历史，是20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几代人不断努力的大目标。20世纪30年代，受到仰韶村、西阴村、城子崖与殷墟等遗址考古发掘的启发，傅斯年提出“夷夏东西”，徐旭生提出“华夏、东夷、苗蛮三集团”，筌路蓝缕以启山林。20世纪50年代，李济在《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中说：“一部能说明中国民族文化之原始的上古史，是现在一般人渴望已久的了。但是如何达到这一目的，却有不同的看法。现在从事这一工作的人相当多，各有不同的见解、立场和成绩。”他说：“我们讨论中国历史最要紧的一点，与过去不同的一点，是我们感觉到，并已证明，上古史的史料除了文字记录以外，还有另外的来源；由这些来源所得的新材料，已经引导出来了新的问题，并且已经是一般史家所接受的了。他们必须收纳考古学与民族学的资料，这些新资料，不但帮助他们解决旧问题，而且启发新问题。”后来，李济在《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论及“古史料的整理与古史的写作”时说：“整理田野考古发掘所得的资料，一个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如何把地下发掘的资料，与传下来的纪录资料连缀起来。这是一个普遍的考古问题。也是在中国区域，考古学家所面临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苏秉琦在《关于重建中国前史的思考》中说：“已出版的《中国通史的史前部分，虽大都企求在理论指导下运用考古材料和古史传说，但限于目前的研究水平，理论与材料、考古材料与古史传说之间，难免缺乏系统的、有机的结合，尚未形成中国前史的科学体系。考古学的最终任务是复原古代历史的本来面目。除了传说材料，史前时代没有确切的文献记载可供依据，建立史前时代信史的任务自然就落在考古学家的肩上。”

从《考古文化研究与文献解析：重构古代传说历史》书稿里我看到，常兴照为了“重构古代传说历史”，“尽可能科学地认识和解读中国古史传说和考古学文化的关系，也就成为自己始终不舍的追求”。当他写完书稿以后，又深有感触地说道：“将考古学研究和文献论证有机地结合，综合相关学科的技术手段，深入研究和复原中国传说历史，仍然是目前和今后历史与考古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如何解决李济所说的“把地下发掘的资料与传下来的纪录资料连缀起来”这个普遍的考古问题，《考古文化研究与文献解析：重构古代传说历史》提出了一个方案，做出了一种努力。

这本书把考古学文化与古史传说分别排列出不同的序列，然后找出考古学文化分布和变化节点的“缺口”，结合历史文献分析，将古史传说的序列与考古学文化的序列相对照，再与“缺口”进行“拼接”，最后推断出考古学文化的族属。该书认为，“五帝时代”或曰“传说时代”，早在仰韶时代早期就已开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基本代表了传说时代的早中晚三期，这个时代有四次大范围的考古学文化变迁和转折，亦即考古学文化与古史传说“拼接”的“缺口”。

第一次是后岗一期文化的变化、迁徙与庙底沟文化的演进，这种文化现象与炎黄战争、征杀蚩尤的传说历史基本契合。由于蚩尤争夺了炎帝的帝位，引发了炎黄大战。蚩尤部族是炎帝集团的主要力量，汶、泗河流域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早期文化以及后岗一期文化是蚩尤集团的主体文化。

第二次是在大司空文化、秦王寨文化、大汶口文化中期形成前后的阶段。蚩尤被杀之后，山东地区在黄帝族——庙底沟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新的更具发展活力的氏族集团，这就是少昊清集团；大司空文化应该是颛顼部族的物质文化；秦王寨文化最有可能为共工氏的物质文化遗存；大汶口文化中的秦王寨文化因素，大概与后期“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玄昊”有关。



第三次是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大汶口晚期文化形成并发展为龙山文化的时期。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以陵阳河类型为代表的东方氏族迅速发展，并向西、向南进行了大规模的迁徙和扩张，这是帝舜进行的一系列开疆扩土和政治改革，促进了华夏文化的初期繁荣。这一文化态势一直延续到龙山文化早中期。

第四次是龙山文化中后期的变化。这一时期各地考古学文化的转折和变化，很可能与大禹一族的崛起、独立、征讨、统一的过程，以及流共工、殛鲧、涂山会盟、征三苗等历史事件有关。

考古学文化代表的人群与历史文献记载的部族或族属，能否对应与怎样对应，这是重建古史的首要问题。柴尔德认为，考古器物类型的相似组合之所以反复共存一处，是因为它们曾经被同时代的同一人群所制造并使用，由有共存关系的器物类型所组成的不同组合之所以同时出现，是因为它们为不同人群所制造，文化就是相互关联的类型的集合体，因为它们是被同一批人群制造出来的，考古上器物类型之所以会重复地共存在一起被发现，是因为它们是同一个社会中已经标准化了的行为模式的结果，这种反复出现的相互关联的类型组合，在考古学家的意识中，自然就是一个“文化”，即分布学的分类单位。史前学家的任务就是重建能够确保它们相互关联的行为模式，这样，考古学资料的组合就会被赋予鲜活的生命意义，与之相应的文化的名称也会获得一种历史的含义。张忠培指出，考古学文化也是由不同谱系的文化因素结合成统一的文化，从客观实际看，正像民族学所研究的亲属关系可分解成直系和旁系，以及血缘与姻亲那样，考古学文化也是一个开放系统。既然考古学文化是多元的谱系结构，那么，谱系分析就成了按考古学文化的本来面貌，来观察、研究考古学文化的一个重要方法。据此可以认为，某一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序列的核心是谱系。如果序列中的各种考古学文化之间不存在谱系关系，那么这个序列仅仅是这些文化的编年。

中国古史传说上的部族关系的核心也是谱系。李学勤说，《大戴礼记·帝系》详细记载了黄帝二子的后裔谱系，《帝系》这种三代统出一源的谱系，在近代备受学者的诋评，以为子虚杜撰。不过既然各种古书都会记有基本相合的传说，意义是不容抹杀的。我觉得如果细心推求，其中不乏启示。缕析古史传说上的部族谱系的关键是族姓，族姓要是乱了套，谱系也就难以分得清楚。

至于如何处理文献史学与考古学的关系，朱凤瀚认为，中国考古学既然在学科上归于广义的历史科学，也就不可避免地要与 中国发达的文献史学发生密切联系。如何处理文献史学与考古学的关系，近年来学术界多有不同意见，并已展开较充分的讨论，这里似毋庸赘言，但可以进一步思考的是，为什么会对二者应建立密切关系产生歧见。主要原因之一似是对先秦文献可信性的看法存在差异。考古学家在参考历史文献时，自然要选择经过严格辨伪与考证后甄选出来的较为可信的历史文献。以文献研究为主的历史学家，应该了解考古学的学科特征并尊重其相对独立性，重视用科学的考古材料来丰富、印证或更正自己的认识；同样，考古学家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学者，也应了解并尊重众多历史文献学家与历史语言学家对先秦文献成文年代与其记载可信性的研究成果。先秦文献对上古史的记载的确有顾颉刚所指出的“层累造成”的特点，有着历代因宣扬某种主流意识而对文献所做的修改，有着因传抄或师说不同而出现的多种文本，但这些都并不能完全否定历史文献记载的可信性。

最后我要说的是，常兴照从学考古、做考古到重构古史研究，40多年来，不管在什么样的境况下，始终锲而不舍地追求，他之所以如此执着，就是“因为爱所以爱”。

《考古文化研究与文献解析：重构古代传说历史》
作者：常兴照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 年 5 月

■ 新书评论

北魏历史与考古研究的力作

——《营居盛乐：拓跋鲜卑在代北的都邑与军镇》评介

王大方

由内蒙古自治区“长城资源调查队”领队张文平研究员著的《营居盛乐：拓跋鲜卑在代北的都邑与军镇》（以下简称《营居盛乐》）日前出版发行。全书15万余字，10个篇章，包含彩色图版、古代城邑地图与墨线图多幅，是一部关于北魏政权在代北的都邑与军镇的考古与历史研究报告，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北魏，是继十六国后在中国北部重建的统一的封建王朝。公元4世纪初，拓跋鲜卑在今山西北部、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建立代国，后为前秦苻坚所灭。淝水之战后，拓跋珪于公元386年重建代国，并称王。同年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东、西魏。东魏为北齐所代，西魏为北周所代。

作者在长期从事秦汉、北魏长城调查与研究的过程中，摸清了内蒙古自治区、山西省、河北省境内的秦汉北魏长城，以及北魏各个军镇的历史情况，在此基础上写出《营居盛乐》一书。在书中的各个篇章里，作者围绕北魏“圣都”盛乐，以及盛乐与北魏“国都”平城的关系，研究和论述了“云中与盛乐”“平城京畿与北魏六镇”“北魏平城时代”“参合陂之战”等历史和地理问题，将北魏拓跋鲜卑在代北的都邑与军镇的历史、考古、地理以及少数民族语言、传统文化等紧密结合，提出了一些新颖的研究成果与观点。

《营居盛乐》紧扣盛乐与六镇位置，对学界关注的一些问题展开讨论，多有值得重视的见解。诸如将“定襄之盛乐”和“云中之盛乐”分别定位在呼和浩特和大黑河流域的东部和西部，使史籍中出现的两个“盛乐”的地理位置和管辖范围更加明确。作者结合史料记载，首次提出“盛乐”这个名称“应为鲜卑语、契丹语音译”的看法。根据对“定襄之盛乐”和“云中之盛乐”的初步定位，对至今晋蒙两地文物考古界仍在研判与寻找的“盛乐金陵”的所在地，提出了“位于大黑河沿岸”的新观

■ 新书资讯

申遗40年，中国何以影响世界

——《千山万水——中国申遗故事》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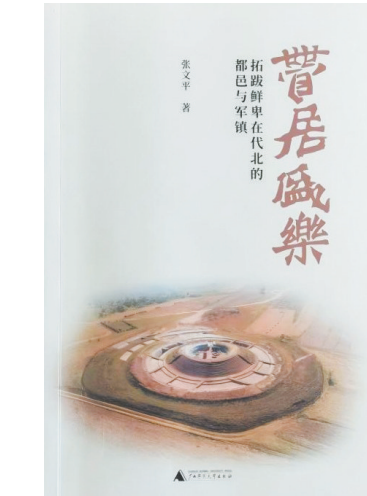
钟文

9月19日，《千山万水——中国申遗故事》新书分享会在北京举办。活动聚焦中国申遗40年历程，邀请庐山国家公园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及管理规划项目负责人陈凯、北京中轴线申遗文本团队核心成员郑楚晗两位遗产保护专家，畅谈从20世纪80年代我国拥有首批世界遗产到如今60项遗产，走过的独具特色的申遗之路。

活动开场，嘉宾们便深入探讨了世界遗产的诞生背景。世界遗产概念源于“二战”后对战争破坏文化遗产的深刻反思。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诞生，标志着全球对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的重视达到新高度。中国于1985年加入该公约，自此踏上申遗征程。从最初的懵懂探索，到如今在世界遗产舞台上大放异彩，中国已拥有60项世界遗产，这背后是40年的不懈努力与探索。

陈凯分享了庐山申遗的故事。1996年，庐山以中国第一个“文化景观”的身份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起初，庐山申报的是“自然与文化双遗产”，但因当时“文化景观”概念的兴起，其独特的人与自然共生的特质得以凸显。陈凯回忆，早期申遗文本虽简单，但庐山丰富的文化底蕴却难以掩盖。东林寺作为净土宗祖庭，见证了佛教文化的传承；白鹿洞书院则是宋明理学的重要发源地，朱熹在此讲学，影响深远。此外，庐山的自然景观同样令人陶醉，五老峰的雄伟、鄱阳湖的壮阔，以及变幻莫测的云雾，构成了庐山历史的魅力。庐山不仅见证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的交融，而且承载着中国传统隐逸文化、山水诗词文化的传承。如今，庐山依然保留着独特的生活气息，山上的特岭镇，居民生活与自然和谐共生，让游客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浓厚的人文氛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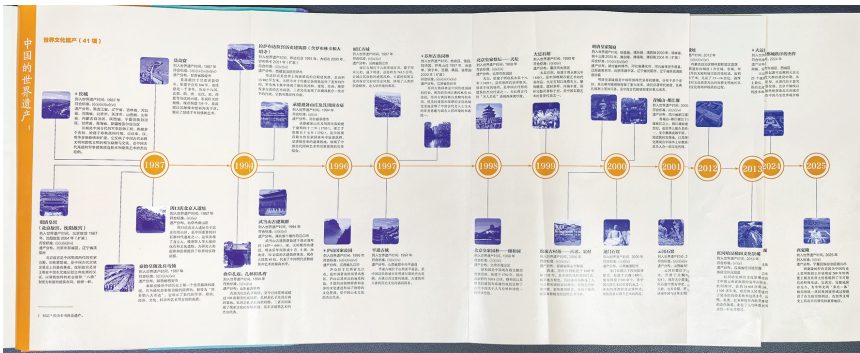
郑楚晗详细介绍了北京中轴线申遗的艰辛历程。北京中轴线从2012年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到2024年正式申遗成功，历时12年。郑楚晗自2017年入职便参与其中，见证了中轴线申遗的关键阶段。北京中轴线的申遗材料经由多次国际、国内专家研讨会的讨论，以及多项专题研究支持的修订，愈发厚重与完善，充分



点。这部著作还结合考古发掘与研究，对60多年前乌兰察布凉城县小坝子滩金银器群的来历作出详细分析，提出魏晋时期拓跋鲜卑即与西晋王朝有着密切的交往，进一步推导出拓跋鲜卑沙漠汗从晋朝归来，将对其社会变革产生一定的影响，最终可能在凉城县小坝子滩遭到保守势力暗害的“假说”。

《营居盛乐》中还提到：史籍中的“参合陂”应当是一个“湖泊”，具体即是今天的黄旗海，并由此展开了对参合陂之战的详细阐述。作者通过实地考察认为，位于黄旗海东、西两侧与山地之间的间隙，是南北交通的通道。在古代，黄旗海与大同盆地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黄旗海扮演着“平城北塞”的重要角色。

作者认为，拓跋珪与后燕的参合陂之战，北魏选择在黄旗海以东、孤山之南的万亩滩上展开绝非偶然。拓跋珪在追击后燕军队的过程中清楚地知道，如果后燕军队行进地区超过黄旗海以东、以南的话，自己就会彻底失去与之决战的地利。所以一定要“急追之，晨夜兼行”。拓跋珪出生于“参合陂北”，对于黄旗海及其南北一



书尾的中国世界遗产介绍页

体现了对遗产价值的深入挖掘与阐释。北京中轴线不仅是《考工记》所载传统都城理想规划范式的完美体现，更是“中”和“和”文明传统的重要载体。中轴线并非简单的建筑集合，而是从元代到明清，再到近现代持续发展的城市规划典范。在申遗过程中，如何平衡遗产保护与居民生活需求成为关键。例如，在整治钟鼓楼周边环境时，既要维护屋顶风貌的完整性，又要尊重居民养鸽子的传统，通过精心设计鸽舍，实现了保护与民生的双赢。

正如出版后记中所说，本书策划的初衷即帮助读者理解中国的世界遗产，策划时考虑到列入世界遗产的时间，从最早的1987年首批世界遗产到2024年列入的北京中轴线；同时考虑到了遗产本身的年代，如距今5000年的良渚古城遗址到近代的鼓浪屿，时间跨度长达数千年。本书遗产的覆盖范围，跨越了大半个中国。不仅有蜿蜒万里的长城，还有贯穿五条大川的大运河。遗产类型更是丰富多元，有建筑奇迹、江南园林、古城遗址、绝壁岩画、美丽海岛、高原茶山……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多样性的宏伟画卷。书中的很多遗产地都是著名的旅游景区，比如长城、庐山、乐山大佛、苏州园林、鼓浪屿等，如果没有专家的解读，常人很难真正看懂它们的价值。本书的撰稿人都是文化遗产领域的专业研究者，他们大多参与了申遗的过程，为读者精准提炼遗产地的核心价值、深度解析其独特的看点。除了对遗产价值的充分阐释，还特别邀请作者增加了申遗故事。读者可以了解到申遗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

线的地形环境极熟悉。他深知孤山之南的万亩滩是一个绝佳的战场，是它能够把握战机的最后一个地方。运气最终站在了拓跋珪一方，在追击到万亩滩的战场上，他给予后燕军队以致命的打击。

此战，拓跋鲜卑消灭了后燕的有生力量，打通了从盛乐至大同盆地的通道，最终于天兴元年（398年）定都平城，实现了拓跋鲜卑长期以来问鼎中原的梦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参合陂之战是决定北魏政权命运的决定性一战。此论读来，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通过《营居盛乐》一书还可知道，北魏镇将的政治影响力很大。其中，怀朔、武川两大军事集团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最为巨大。以高欢为首的怀朔集团与宇文泰为首的武川集团双雄并立，最终导致北魏分裂为东、西两国。怀朔、武川集团，相继建立了北齐、北周，连同此前的东魏、西魏，之后的隋、唐，前后影响中国历史达数百年。在北魏前期，镇将多以宗室或鲜卑勋贵担任，他们不仅在军事上有很大的权力，在政治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北魏孝文帝改制后，虽然镇将的地位有所降低，但他们仍然在地方上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北魏六镇设立之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柔玄镇与怀朔镇逐渐成为东、西两个中心军镇。在这部著作中，还标明了多处北魏的古城名、六镇城邑文物，以及大量体现考古、地理信息的地图。

总之，《营居盛乐》一书，是近年来我国关于北魏历史与考古研究的一部力作。书中提出的与以往不同的学术观点和看法，大部分具有较强的合理性，值得关注。

（作者单位：内蒙古文物学会）

《营居盛乐：拓跋鲜卑在代北的都邑与军镇》
作者：张文平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 年 6 月



精彩故事，了解到申遗团队乃至公众在其中付出的种种努力。比如最初想以混合遗产申报，最终以“文化景观”身份列入的沮丧；又比如国际专家考察前夕遭遇超强台风、公众参与保护的温暖故事……书的最后还增加了拉页，以便读者完整地 了解中国已列入世界遗产的项目概况。

此次新书分享，让现场观众对我国申遗40年的成就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看到了我国在世界遗产保护领域的不懈努力与贡献，也为大家打开了一扇认识世界遗产的新窗口。相信在未来，会有更多人走进这些遗产地，感受它们的魅力，共同守护人类文明的瑰宝。

《千山万水——中国申遗故事》
作者：吕舟 等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时间：2025 年 8 月

MicroWise
system
—
无系统

应用场

智慧保

智慧管

智慧服

环境控、环境监测、本体监测、储藏设施、文物展柜、文物运输监测、文保修复实验室装备.....

藏品管理、资产管理、人员管理、客流监测、数字资源管理.....

数字化采集、数字化展陈、智慧导览、展柜换气率评测服务、熏蒸消杀服务、咨询服务.....

官方微信

官方网站

西安元普系统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MicroWise System Co.,Ltd.

联系人：张总13572270596
座机：029-88346362
邮箱：info@microwise-system.com
网址：www.microwise-system.com